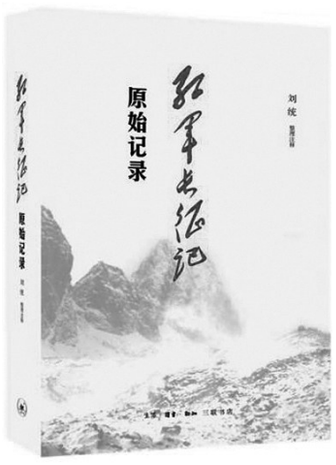
呈现长征原生态的集体口述

本报记者 史冬柏

提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随着时间的洗礼，长征已经从“中国语言”演变成为“世界语言”。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征文活动，就与长征有关。《红军长征记》，原名《二万五千里》，正是这次征文的成果，也被研究者视为最早的长征集体口述史。这本书1937年2月在延安编完，在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辗转相传，经刘统重新整理注释后，今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最近很少读这么厚的书，700多页。字数多，但决不繁冗无味。虽是历史记录，但更似小说，每个故事既有连贯性，又独立成篇，风格不一，引人入胜。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这是一句为国人熟知的经典用语，可见长征精神早已融入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成为励志格言。大实话里有真理，长征确是人类苦难的一座“珠穆朗玛”，令人惊叹，比较之间，更令人珍惜当下。

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一年后，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

当时的情形什么样？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7000余人，几乎弹尽粮绝，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加上严冬奇寒，部队饥寒交迫，困难重重。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向国内外各界募捐，渡过难关；二是为了向全世界宣传红军，扩大影响。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杨尚昆联名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一声号召，迅即点燃红军将士的创作热情。领导同志如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等带头写作，许多拿枪杆子的人，如张爱萍、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等，也都拿起笔杆子，记录下鲜活而珍贵的回忆。

1936年10月底，红军总政治部就收到200多篇稿件，约50万字，内容有战斗经过，有民情风俗，有奇闻趣事，堪称全景式呈现长征原生态。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女作家丁玲深受感动地写道：“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起的征文活动，可以说是党内和军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文化创作活动。1936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离开陕北时收获满满，他带走的资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用粗糙质朴的原始记录保存真实

《红军长征记》“关于编辑经过的说明”中这样写道：“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谜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的确，透过粗糙质朴的文字，今天的我们更容易触摸到长征最真实的面貌。

“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红军出发前的某天，何叔衡这样问董必武。在出发前，红军主力究竟向什么地方转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曾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董必武在《出发前》里记述了长征之初的情形。

“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李富春在《夜行军》中记录了做火把的经验和心得，笔触堪称细腻而精准。

长征苦，但红军将士苦中作乐。《夜行军》中还记载，当没有敌情之忧时，大家甚至半夜高歌，“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以至于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李富春、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等同志组成了合股“牛皮公司”，也产生了“徒步旅行家”，一路走一路谈，忘记了疲倦。如此趣笔，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的充满豪情。

最扣人心弦的还是战斗记录。刘亚楼的《渡乌江》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向着乌江进”“一次强渡”“‘水马’在乌江”“坚决突过去”“江边剧战”“一个连猛追三个团”，激战场面跃然纸上，何时读来都震撼人心。

“大概因为红军是中国人民救星的缘故吧，从它出生以来，便无时无刻不在国民党军队‘欢送’或‘欢迎’中。”《吴起镇打骑兵》这番描写显得多了几分生趣。文章以诙谐反讽的口吻，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形容为“欢送”，通篇以这两个字贯穿，直至尾声：“这一铁拳的挥动，终于辞退了苦苦‘欢送’的四团骑兵。当残存的2/3的人们正惊恐喘急，马上加鞭的奔跑中，我们长征二万里的红色英雄们，从数十里的山头上，集中收兵。暮色冥茫中，浮起了毫不疲乏的，轻快得意的《打骑兵》歌声。”这样的文字和流露出的气息，真叫一个酣畅淋漓。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和前行的力量

翻阅这部原始记录的过程，注定是在精神世界中再走长征路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持续深入，心灵越会为长征这段历史所征服，为长征精神所征服。

长征不仅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具有超出国别的世界意义。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红星照耀中国》中，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美国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有《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认为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美国军事学家塞缪尔·格里菲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书中，将红军长征与公元前400年色诺芬率领1万希腊人从波斯撤退到黑海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认为，“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

一部英雄史诗，一座巍峨丰碑，一次伟大壮举，一笔精神财富。不由得想起时而在互联网泛起的解构长征的沉渣，在这个问题上，可千万别掉进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无论你是否亲自走过长征路，但通过阅读和追思，在精神世界里沿着先辈足迹走上一遍，从中汲取信仰和前行的力量，你一定会赢得自己人生的新胜利。

真实的将军

祝新宇

“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段每个读书人都能倒背如流的话，被奉为长篇小说最伟大的开头。马尔克斯完成《百年孤独》的多年以后，中国读者能够在很多本土作家——从领军人物莫言到新生代双雪涛的作品中看出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事实上，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评论、诠释《百年孤独》的文章非常多。1971年，马尔克斯在巴塞罗那接受采访时说，“有关《百年孤独》的最初想法，就是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去看冰块的形象。”外祖父带着马尔克斯去看单峰驼，后者偶然看见了冰冻鲷鱼，外祖父向他解释了什么是“冰冻”。马尔克斯说，“在单峰驼和冰之间，我自然倾向于冰，因为从文学的立场上看，它更容易引起联想。”

马尔克斯将《百年孤独》比作扔出去的香蕉皮，大多数人都被滑倒了。他也流露出对有关《百年孤独》的问题的厌烦，而谈起其他作品，例如《迷宫中的将军》，则兴致盎然。中国和南美很多国家教材中的玻利瓦尔将军，被定义为南美伟大的解放者。与我们看到的一样，玻利瓦尔的形象在马尔克斯眼里最初是呆板、模糊的，尽管所有的将军肖像都有显著的两撇胡子。将军47岁那年，曾沿着马格达莱纳河到加勒比海。历史文献恰好缺失了这一段。为了写好小说，相同的路线马尔克斯居然重走了11次。

《迷宫中的将军》第一句话就直接“扒下”了将军威武的制服，“侍候他时间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他赤裸着身子，睁着眼睛在浴缸的净化水中漂浮着，他几乎以为他已溺毙身亡。”有人问马尔克斯，什么时候想到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形象？他说玻利瓦尔年轻时的话给了他灵感，“我会在贫穷和赤裸中死去”。他在一个英国外交官那里打听到，“外交官去了总统府，发现玻利瓦尔赤身裸体躺在吊床上，吹着共和国进行曲的口哨，一边用脚趾打着拍子。”严肃的历史学家认定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但马尔克斯如获至宝，他说，“我用不着波哥大的寒意，用不着他身为总统的事实，什么都用不着。那个就是玻利瓦尔，在吊床上晃悠，赤身裸体。”

马尔克斯走过马格达莱纳河11次，他也接受了11次访谈。访谈中的马尔克斯也仿佛被扒下衣服的将军，使我们看到了他的诸多秘密：写作的、生活的以及政治观念的嬗变历程。马尔克斯承认，“我在家就是光着身子的”。正如他对玻利瓦尔的看法，“玻利瓦尔既是他自己，也是他的对立面。你发现有一句话证明他是赞成君主制的，你很快就会发现另一句话证明恰好相反。”马尔克斯否认玻利瓦尔说过“我再也不会坠入情网了，这就像是同时拥有两个灵魂”，而是他说的。结果没到一分钟，他又说，“嗯，稍微等一下，是玻利瓦尔说了那句话。”接受采访时，他把创作中的素材、文案、背景材料和写作方法当作魔术师的秘密，捂得严严实实，“就像魔术师决不会将帽子里变出鸽子的方法告诉别人”。但我们看这些访谈——例如文章开头马尔克斯谈单峰驼与冰块的选择——关于素材来源，小说人物与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写作方法及经历、感悟，马尔克斯侃侃而谈，如同一个男孩在炫耀他的玩具，生怕你看不到，甚至夸大其词。

马尔克斯认定的唯一官方传记作家杰拉德·马丁对此直言不讳，他在《马尔克斯传》序言中说，“马尔克斯喜欢编造故事，更喜欢吹牛。同时，他也非常喜欢开玩笑，反学术，偏爱神秘，明目张胆地离间，正好让记者失去线索。这是他称为‘格兰德大妈主义’的一部分。”“格兰德大妈主义”的典故来自马尔克斯的短篇《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寓意几乎可以等同“戏谑”。它完美地诠释了马尔克斯的性格和文学风格。一方面，有关其作品的解读文章，基本入不了他的法眼；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喜欢大谈特谈。马尔克斯在访谈中，多次扮演了自己，让我们看到了他不同的外表和思想。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马尔克斯。

那些旧物件见证的变迁

本报记者 王云峰

提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物事离我们越来越远，包括那些青砖黑瓦下的乡村旧物，及其承载的乡村生活与民俗风情，都不复以往。既然无法挽留，那么就趁着尚存留记忆，用真实而朴素的文字将其一一记下，让它们在记忆里继续发光。《瓦檐下的旧器物》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透过消逝在岁月深处的一代代农人的乡村旧物，将南方乡人的记忆一一呈现。那即将成为历史的农耕文明与炊烟岁月，还有沉淀几代人的酸甜苦辣都被作者用深刻而温暖的文字充分表达出来，仿佛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

旧器物里有渐行渐远的农耕岁月

这是一本关于故乡的书，作者在书中对自己儿时乡村中的近80种曾经日常使用但今天即将消失的旧器物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细腻深情的描述，并配以具有艺术价值的彩色插图，对过往的南方农村生活进行了全景展示。

作者所生长的八公分村是一个普通的湘南山村，那里的人们生活简单而又朴素，日子被日常中的器物牢牢套住。

村里每个人都离不开木凳。木凳以杉木为主，都是四条腿，区别在于面板的长短、宽窄与厚薄，大体有四种：矮凳、独凳、宽板长凳、长凳。矮凳多给小孩子坐，成人长时间做一些离地面很近的活儿也坐矮凳，如剁猪草。独凳是矮凳的升级版，比矮凳高大，更适合一个成人独坐。最宽最长的是宽板长凳，这是每家灶屋里的专门坐具，通常一户人家有两条这样的凳子，呈曲尺状靠墙摆放，围着正灶，一家人一日三餐都是坐在这里。长凳则是宽板长凳的缩小版，面板更窄，也更短，能坐两个人。长凳多是夏秋间用来闲坐的。村里人通常在厅屋里或檐门口，摆放几条长凳，随时坐歇。作者儿时，家中的木板床也是用长凳铺搭。两条长凳靠墙摆放，一端一条，搁上木板，铺上稻草和席子，就是床了。

关于凳子，作者记得，夏秋之夜，青石板巷里（八公分村每间老厅屋的大门外都是一条光亮的青石板巷子），各家长凳矮凳纷纷摆了出来，坐凳上吃饭、闲聊，巷子里碗筷之声叮叮当当。吃过饭后，孩子们奔跑、玩耍，大人们说古论今。那些主妇们，喊喊喳喳，往往要到夜色已深，才打着哈欠，收拾长凳矮凳进屋。

通过一个个旧器物，乡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景、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审美方式被一一呈现。旧器物代表一个乡村的味道，一旦与人及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精神的气场。

每天早上，家家户户挑水、剁猪草、煮潲，厅屋里烟尘弥漫，浓浓的青烟在天井口汇聚，升腾而上，飘散在高高的瓦屋上空。“厅屋里人口多，养的鸡鸭鹅狗也多，鸡笼、鸭笼、潲桶、水桶、竹篮、竹筛、扁担、八仙桌、长凳，种种家什，都要一处安放，也就显得局促了。四时八节，一个厅屋的主妇们，先后在神台前化纸焚香，虔诚祝祷。遇着娶亲嫁女的喜庆日子，厅屋里摆了酒席，宾客满座，喜气洋洋。而在老人去世的时候，厅屋里停放着黑色的灵柩，点一盏神灯，也有了几分让人望而生畏的恐惧。冬日长闲，厅屋里常有匠人驻足，做木工、打砻、编织蓑衣、修补套鞋，引来众人围观。”

在作者笔下，旧器物有如一条绳索将我们曾经熟悉的乡村生活轻松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那原本渐行渐远的农耕岁月仿佛倒流回来。

旧器物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本书还以人文视角观照农村的变迁，通过一些旧器物见证了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交替。

千百年来，农耕是八公分村人赖以生存和绵延的根本，全仰仗犁和牛这两样农家最为珍视的宝贝。犁的模样几乎是凝固的：底下是一根方木，这底木的前部立着一根短方木，叫犁箭，二者交叉处是一块光滑的生铁犁瓦，底木后部斜着一根长的扶手，与扶手、犁箭相连的是曲辕。木犁看似简单，但会制作的人很少，那曲辕的木材也难找，通常要寻遍山林，才能找到大小合适的杉木或樟木。

那时村里会犁田的农人不少，多数是中老年男子，他们有一套专门驱牛的简单语言，能被牛准确理解和遵行。当一个老农驱着牛犁田，田野上是热闹的，他的高亢而长拖声调的喝令，不时响起，随风飘荡到远处。那犁箭在田泥里的深度平整均匀，犁瓦边不断翻转开来的田泥断断续续、错落有致，一圈一圈，像不断雕刻的生动画板。

恢复高考以后，村里人潜意识里，扛犁耕田是没有出息的，只有那些读书吊儿郎当，被认定一辈子将会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才会被家长勒令下田去。

不久，在改革大潮和打工热潮的裹挟下，村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开始大量涌入广东，进入城镇的工厂流水线和建筑工地，打工的收入远胜于耕种。八公分村逐渐没有人养牛养猪了，鸡鸭鹅狗都很少了，犁耙无用，磨坊倒塌，榨油坊拆毁，池塘干涸，田园多有荒芜……

村里老式木犁越来越少，以柴油机为驱动力的简易耕田机时兴起来。终于有一天，村庄不见了牛的踪影，那些木犁也再无用武之地。

2005年，武广高铁动工修建。八公分村因为铁路线南北贯穿而过，被列入拆迁范围。那些青砖黑瓦的老宅，那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成的瓦房和平房，大多夷为平地。那些曾为几代人所熟悉的旧时的乡村器物，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渐渐消逝在岁月深处。

八公分村，数十年来的起伏，成为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八公分村人不再局限于农耕，人们的生活更为丰富，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一代代农人的乡村旧物，渐渐蒙尘远去。而此时，作者通过本书将这些旧器物一一擦得锃亮，是在为一个时代保留一份乡土记忆。虽然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空间由乡村转向了城市，但乡土之魂的本质还保留在内心深处。作者面向乡村透过旧器物叙述生活，不单是抒发留恋故乡之情、回归传统之心，而且还有帮助人们在迷惘中寻找精神寄托之意。

此外，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本书对旧器物所承载的乡村生活的纯粹书写和农村变迁的人文观照，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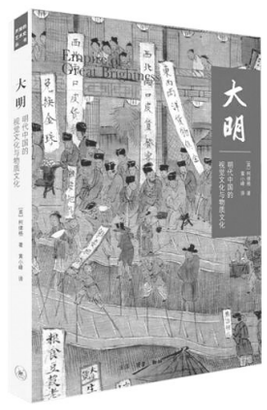
■书单

重现明代人的视觉体验

一帧帧的旧时光缭绕于一期期的书单里。如果终年荐读，你依旧一页书也不看，真想推完这期就去“葛优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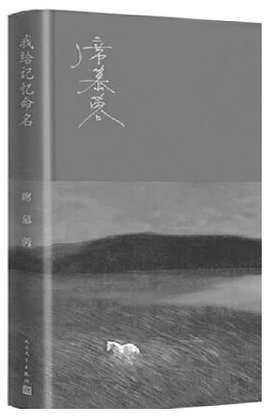
本期书单的主打推荐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历史读物——《大明》。这本书通过丰富的图像和实物材料，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明代。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帝王的更迭，没有面面俱到地介绍明代的人物和事件，也没有大轮廓地勾勒明代的兴衰，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观念，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娱乐、暴力和年龄的观念……甚至讨论明代灭亡之后的“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是如何被重新编排、重新想象的。作者通过强调同时期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互动往来，挑战了明代中国故步自封、孤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存在的观点。书中运用的插图资料选自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收藏，既有大量书画、瓷器，也有兵器、家具、服饰、货币、丝织品、书籍印刷品，用以阐明明代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然而，作者无意写作一部把各种不同材质、形式、尺寸的艺术品串联在一起的“明代艺术全史”，而是试图在明代各种艺术品、物品之间找到关联，把它们激活，让这些曾经被观看、触摸、使用的物品重现明代人的视觉体验，由此展现一个真实可感、可与现代人对话的大明王朝。

此外，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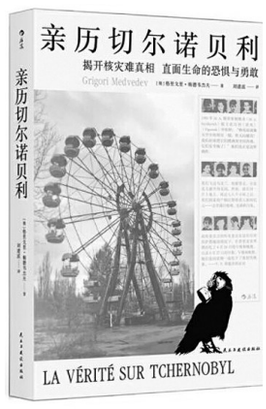
《大明》

本书源于作者柯律格2004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8次“斯莱德美术讲座”。作者的目标是震撼西方的听众，让人们抛掉心中可能有的对明代中国的成见，尤其是那种认为明代中国在本性上静止不动而且尘封闭塞的看法。事实上，明代产生的图像和物品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包裹在各式话语之中，为后人探究明代的社会生活及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我给记忆命名》

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之书里，席慕蓉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箧，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其中有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对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的思念与牵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回顾之书，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成长之书。



《亲历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史上最惨烈的反应炉事故发生在切尔诺贝利。33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也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今年，随着美剧《切尔诺贝利》热播，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再度引起热议。本书的作者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上世纪70年代曾担任切尔诺贝利1号反应堆的首席工程师。16年后，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之后，他第一时间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负责进行调查。因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对当时悲剧每日进展的记录，从工程师的角度还原了事故现场及起因，记录了经历现场的人们的证词。